

文论天地

荧屏形象塑造的思维走向

一个时代往往因其具体的历史条件形成一种彪炳时代潮流的主要文艺形式。21世纪以来,凭借着现代化电子传媒的优势,电视剧已经成为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代表着当下大众审美思维发展的最新水平。而荧屏新近出现的一批深入人心的人物艺术形象在创作思维上发生的深刻嬗变,正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思考。

其突出表现在于,荧屏上的英雄人物形象越来越注重黑格尔强调的“鲜明的个性描写”,越来越多姿多彩;普通人物形象越来越注重黑格尔力倡的“生动性与完满性”,越来越不是二元对立的非好即坏。

前者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形象,他那“一根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他那对理想信仰的忠诚和对人民军队的挚爱,以及他在处理与妻子、儿女关系上的不近人情处,都感人至深。接着是《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他那舍死忘生的英雄气概和叫人不能不爱的草莽习气,都真实鲜活,过目难忘。还有《潜伏》里的余则成形象,《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瞿恩、杨立青形象,《我的兄弟叫顺溜》里的顺溜形象……都对广大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后者只消把20年前造成轰动的《渴望》与刚热播的《祈望》加以比较即可明白。《渴望》中的刘慧芳和王沪生,是二元对立非好即坏的两极的典型形象。刘慧芳是“善”的典型,好事让她做尽,倒霉的事都让她承受。“文革”中,她古道热肠,抚慰被打成“狗崽子”的徒弟王沪生受伤的心灵,始为其师傅,继为其妻子;为照顾养女小芳,丢了工作,失了家庭,累垮了身体,连亲生儿子的抚养权都未能保住。这位极端的“好人”形象,确实煽情,令人扼腕叹息。而王沪生则是另一极端的“坏人”形象,他忘恩负义,喜新厌旧,冷漠寡情,是个十足的“当代陈世美”。而《祈望》中的人物形象则立了许多。男主人公姜文君,工作敬业,生活严肃,爱妻子,疼女儿,孝老母,但性格的偏执却里外得罪了不少人。女主人公芦苇在家可谓贤妻、慈母、孝媳,在外堪称尽职尽责的优秀护士长,但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却有着“小女人”常见的毛病。还有那个也举足轻重的角色蒲剑峰,尽管因“花心”毁了家庭、因经济富足丢了公职,但却并非坏人,

目前,荧屏上最受关注的综艺形式就是竞相赛歌,或曰“K歌”。东方卫视的《民歌大会》的定位较为特别。它并不有意追求外在的热闹与激烈的竞技,也不重点考验歌者的勇气与评委的才智,而是适当采用时尚元素和明星班底,力图发掘民歌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使观众在歌声中体会归根的眷恋与怀旧的情感,进而传达一种社会需要的主流的核心价值观。

民歌来自民间。民间与天空和大地更加自由、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日益都市化的、物质充盈、电声弥漫的时代,跟大自然的风雨雷电、莺歌燕语保有同样旋律和节奏的民间歌曲,打动观众的不仅仅是自在的素朴和真诚,而且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爱与生机。这是歌曲的发端,也是人文的根源。这些民歌可使人须臾摆脱入耳的嘈杂与尘世的喧嚣,徜徉在茫茫戈壁、无边草场与山水田垄之间,伴随着天籁之音坚定地走向灵魂的家

园。

《民歌大会》很少呈现民歌的“原生态”,选曲方面更是主要集中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民歌红唱”部分,但这恰恰是民歌、民间精神以及新中国的红色记忆在城市空间、电视媒介与流行文化中得以传承的重要手段。当影视明星郭晓冬、张恒纵情高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时候,当港台歌手赵传、容祖儿放声唱出《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时候,观众们已经不太在意这些“歌手”的演唱水准,更不太会在意这些“民歌”本来应具备的细致入微的民间表达方式,而是被这些仿佛来自高天厚土的自然旋律和节奏所激动,一种恋家乡、爱祖国的内在情感被唤起,并集体认同了共和国那一段新行渐远的历史记忆。通过这种方式,《民歌大会》再一次从精神上激活了民歌的自然天性,又较为成功地在“民歌”与“红歌”之间找到了重要的结点,将悦人的娱乐色彩、感人的文化情怀与化人的政治导向整合在一起,成为当下荧屏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民歌是民族的声音。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赫哲族、壮族、瑶族、白族、黎族、佤族等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正是主要以民歌为载体,强化了本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特别是在《翻身农奴把歌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敖包相会》、《乌苏里船歌》、《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民歌声中,充满着各民族团结在新中国的欢快感与自豪感。这些浸润着民族生活方式与民族精神文化的民族歌曲,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歌曲的民族风格,既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音乐发展的丰厚资源,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宝贵财富,需要在任何时候、以各种方式发扬光大。《民歌大会》正是一种倡扬民歌的“大会”,力图借助民歌的美丽与魅力,在荧屏上复现各个民族的精神和气韵。无论台湾艺人王思聪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还是马羚母女表演和讲述的佤族歌舞,都能给观众带来别一种心灵领神会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对相应的民歌产生一定的兴趣,进而开始关注与欣赏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及生存状态。如此看来,与其说《民歌大会》是电视节目针对民歌进行的音乐层面的演绎,不如说是在利用民歌表现一种丰富多样的文化情趣与和谐共生的民族观念;这样的动机,既能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也能契合大多数电视观众的心理。

诚然,为了调动电视观众的兴趣,《民歌大会》在明星选择、节目设计与互动环节等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为了“趣味”放弃“品味”的现象,这是栏目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但不能成为继续存在的理由。只有以民歌为主体,才能使《民歌大会》摆脱目前大多数综艺节目的急功近利,并拥有某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也只有紧紧抓住民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蕴,才能使电视观众获得心灵的慰藉,回到歌中的家园。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国画)

陈铭铭作

“九一八”后,人们踏着坎坷泥泞的黑土地,背井离乡,长途跋涉,生死两茫茫。这是军旅画家陈铭铭历时四年创作完成水墨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画面。这是一幅长6米高3米的中幅水墨画。画家采用他一贯的“重”和“黑”的风格来表达悲剧主题。写实的水墨语言,垂直的叙述力度,长驱直入,直达核心,再现了中华民族78年前耻辱的一幕。

如何用水墨的形式把重大历史事件浓缩在巨幅画面里,并使其具有民族史诗性的特质,画家必须下一番苦功。

为了艺术地再现当时那种山河破碎、痛失国土时人民的心情和处境,从而强化后世对历史事件的记忆,画家巧妙布局和精心构图。中国画讲求“简”,但要表现这种史诗性的大场面,人物众多,浓重的悲剧氛围,厚实饱满的压抑感,完全按照传统的水墨画原理显然是行不通的。沧桑的脸庞以及包得鼓鼓的东北老棉袄需要用重墨或焦墨根据水的去向一遍一遍地

穿透历史的笔锋

卓今

皴,但也不是把这种“重”与“黑”一味的铺排,中国画中“无”的哲学意味一样的呈现在画面中,火车的蒸汽和浓烟恰好形成了画面的虚实关系,滚滚红尘,浮游苍生,从而强化了画面的悲怆感。远处的人物用简笔勾勒,留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由于篇幅巨大,绘画时眼、手、心的整体观照在这里派不上用场,这就要求画家在心里对细部与整体有一个抽象的把握。同时,水墨画是一次成型,这也是对画家的水平和功力的一次检验。创作这种超大规格的画,弄不好要失去整体的气韵,要么缺少局部的生动性。但是陈铭铭在这幅画里表现出了他扎实的功底和高超的技巧,即使把每一个局部放大后,其用笔、用墨的把握,干湿浓淡、长短粗细的

天门一长啸 万里清风来

——评民族交响音画《泰山》

臧东升

丰厚文化。

第一乐章云海观日,乐曲在沉寂中弱起,伴之合唱队轻声哼鸣,引领观众进入一个黎明前万籁俱寂的典型环境。使人联想到在那云天相交的东方,一线晨曦由灰暗渐变成淡黄,又由淡黄渐变成橘红。随着音乐的发展,乐曲和合唱越来越强,细致刻画了满天彩霞和茫茫云海组成了华彩无比的景象。当乐曲抵达鼎沸的时

叫绝。第七乐章天街踏雨,编导者奇思妙想,竟然在优美的弹拨乐曲中,给舞台上踏雨的姑娘注入了芭蕾舞的元素,配之以华丽的服饰,正像三联词中所朗诵的那样,“好一幅天上人间画面,那样分不清眼前是踏雨的今人佳丽还是下凡的仙女神媛……”

应该说,作曲家赵季平、张千一、陈春光、刘文金、作家韩静霆、指挥家张式业的加盟,提升了《泰山》的层次,也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作品的成功,让人不得不得想起李白描写泰山的诗句:“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红莲、林朝辉、马丽娜担任领奏,优美的旋律、娴熟的技巧、丰富的表现力无不使人拍案叫绝。